



炎黄文化研究

第十六辑

•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 黄帝陵基金会 • 炎帝陵基金会 主办
主编 赵德润

大象出版社



炎黄文化研究

●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 黄帝陵基金会

● 炎帝陵基金会

主办

主编 赵德润

第十六辑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炎黄文化研究. 第十六辑/赵德润主编.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 - 7 - 5347 - 7810 - 0

I. ①炎… II. ①赵… III. ①中华文化—研究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3526 号

炎黄文化研究 第十六辑

赵德润 主编

出版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成 艳
责任校对 马 宁 张迎娟
装帧设计 王翠云 美 霖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 - 63863551 总编室 0371 - 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省罗兰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324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北一路 30 号

邮政编码 450016

电话 (0371) 66781503

编辑委员会

顾问	张岂之	方克立	石兴邦	赵世超	文选德
主任	张文彬	王晓安	石玉珍		
副主任	赵德润	薛引娥	邓德芳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震中	邓玲玲	刘宝才	肖云儒	何炳武
	邵小强	周雪辉	郑万耕	耿相新	曹敬庄
主编	赵德润				
副主编	王震中	邵小强	周雪辉		
编辑部主任	张 翀				

目 录

专 论

- 要对话,不要对抗 许嘉璐\1
文明对话与文明冲突 林祥雄\3
《炎黄文化研究》与文化走出去战略 王震中\5

炎黄二帝及其时代

- 葛天氏与葛天氏之乐 周书灿\9
炎帝文化蕴含的官德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张雄飞\13

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

- 个人尊严、国家尊严、民族尊严与华人文化交流 葛承雍\18
文化的转型、抉择与发展
——对中国 17 世纪以来文化演进历程的回眸与思考 王 杰\26
泛化文化空间视角下炎黄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模式与策略
..... 莫志斌 朱可鑫\37

思潮与学派

- “八佾舞于庭”
——春秋战国之际“乐崩”现象论析 雷永强\43
王船山《黄书》与近代尊黄思潮的兴起 王兴国\51
论当代中国儒学发展前景的两大问题 李英华\60
论孔老不争思想对当代价值观的意义 刘鹤丹\81

文化丛谈

- 台湾民间神农信仰及其特点 周新发\90
明代八股文与明代的思想文化 王同舟 陈文新\98

文物与考古

- 殷商林业考 苏家寅\102
秦公诸器的研究琐谈 张 翀\109
大辛庄遗址的遗址保护调查与研究 曹 楠\114

文献整理与研究

- 论清华简《金縢》武王崩年及病因 郭伟川 \129
- 反求诸己与散见于事
——“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释义 王 皓 \133

探索与争鸣

- 酋邦与社会分层理论的贡献与不足 王震中 \139
- 《文心雕龙》与“有无之辨”
——刘勰儒家崇有论思想探析 朱 清 \155
- 嬗变
——两汉“人虎母题”图像的时代特征与风格演变 卢 昉 \177

中华学人

- 冯友兰先生的生平及思想 陈占国 \184
- 祖父陆宗达的其人其事 陆 昕 \208

学术访谈

- 国学是“理论”还是“看法”?
——“中西马”对话实录(四) 牟钟鉴 李德顺等 \242

要对话，不要对抗

◇许嘉璐

非常高兴，再次踏上澳大利亚的土地与多国学者在一起探讨“文明对话与中华文化精神”。这次活动是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发起和主办或联合主办的第七届“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也是首次在南太平洋地区和一所优秀的大學一起举办，其象征性的意义非同一般。前六届论坛的举办，已经证明，就中华文化能不能在历史的新阶段为人类未来做出贡献，以及可以贡献些什么进行研讨，是多国学者所乐于参与的。这是因为，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信仰、不同文化间消除隔膜和误解，抛弃偏见和歧视，促进交流与合作，最终达到彼此和睦相处的最好甚至是唯一的方法与途径。

从20世纪末起，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现在，这种对话已经形成了一股潮流，对话的广度和深度日见其增，阻止对抗、提倡对话的声音越来越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在21世纪初即置身于这种对话的潮流中，随后炎黄国际文化协会也加入其中。我相信，这次在美丽的澳大利亚又有了拉筹伯大学成为合作者，论坛一定会产生应有的积极作用。

人类正处在危机之中，地球正处在危机之中。作为一般人或政治家，看到的或说起的，往往局限于经济的、环境的、资源的、社会的危机，而且总以为采取技术或经济手段就可以走出困境，却没有看到或者有意回避了人类的文化危机。实际上，文化的危机才是最根本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不能彻底解决，甚至会饮鸩止渴。文化的问题，人心的问题，只能用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解决。

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只有三个选项：隔绝、对抗、对话。连三岁小孩子都知道，隔绝是不可能的，除非人类全体自杀；对抗是不可取的，人类自古以来的历史，特别是发生在科技和经济最为发达的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以及仍然起源于科技和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之间的冷战结束以后直至今天仍在此起彼伏的战乱与动荡，还有人类对大自然残酷的摧残与压榨，就是对人类自身最好、最严厉的惩罚与告诫，沿此以往，人类也必然灭亡；留给人类的只有对话，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之间的不断对话，唤醒麻木的心灵，遏制无限度的贪欲，呼吁停止相互杀戮，才能挽救人类，才能让我们的子孙生活在安宁幸福之中。我们理应发出这样的声音：要对话，不要对抗；要和平，不要战乱！

对话，是一对一、几对几、群体对群体之间真诚的交谈。对话，意味着多元，

专 论 意味着对文化单极化主张和努力的拒绝和彻底否定。对话的前提是承认、平等、尊重和包容。人类的祖先为我们创造了多元的文化,因为多元,所以可以对话、需要对话,世界也因此而精彩,并不断在异质文化之间的接触、冲撞和交融中得到持续发展、前进的动力。

由于众所共知的历史原因,也因为人类与生俱来的对陌生事物的怀疑、恐惧、排斥的习性,所以两个多世纪以来,在流行于全球的希伯来-希腊罗马-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以外的所有文化都不大为人们所了解。中国,作为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其文化之不被了解、理解,被误解和扭曲尤显突出。这并不奇怪。这也就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坚持不断举办国际论坛的原因。作为一批奉献于人类学术事业的学者,我们无意于所谓价值观输出和渗透,因为从学理上看,向自己文化范围之外的地方介绍自己的文化,是义务,是责任,是善意,是彼此之所需。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佛教是从印度传入的,古印度到中国弘法的佛教僧侣,远远多于中国赴印度取经的高僧大德,他们把向中国介绍佛教视为自己对佛的虔诚;基督教传教士,从四百年前开始不断把福音输入中国,使得基督教、天主教在中国立足,成为现在中国五大宗教中的成员,这些传教士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好莱坞的“大片”、百老汇的歌舞至今还在不断涌入中国。中国人对这些最终都采取了接纳、包容、吸收的态度,结果是中国受益了,发展了自己的文化和经济。一个很现实的例子是,现在全中国学习英语的人达到三亿多,竟然相当于美国和英国人口之和。因为我们需要了解世界,需要了解西方,以便从中吸取我们所缺、所需的文化营养。难道其他文化就不需要了解有着五千年“超稳定”(汤恩比语)历史的中国经验吗?对中华文化的拒绝,吃亏的将是拒绝者自身。

本次论坛的主题自然会引发这样的讨论:在当今世界,中华文化能够给不同文明对话和人类未来奉献些什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将有许多学者就此发表自己研究的心得。我想说,中国人对文化多样化的主张、对开展文明对话的努力、要把中华文化介绍给世界的真诚而善良的愿望,就是中国人价值观的体现,也是对世界和睦、和谐、和平的奉献之一。

(作者:许嘉璐,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

文明对话与文明冲突

◇林祥雄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被中国现代学术界称为“天书”之《易经》对人类文化所下的定义。从东方人的宇宙观出发，通过观察天象，推断与了解时序变化。

西方人的宇宙观对文化的解读则更为深入。“文化是人类在其生活过程中通过工作与劳动所体现出来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所产生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综合整体”，“文化是人类在历史上某一时间段的物质与精神的基础上所发生、发展与创造社会精神生活形式的总和……”，“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生活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

总之，社会与文化息息相关，俯瞰人类历史的兴败与沉浮，莫不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有着深厚与渊博文化沉淀的民族与国家，它的落后与贫困是短暂的；相反地，一个没有文化与历史的民族与国家，它的繁荣与富有也是短暂的。

文化对于人类犹如人体内的血液，更是灵魂的精灵。人在短暂的生命中创造了无限的空间与历史。文化升华到智慧时，不但可以改变自己的生命，更可改变人民群众的命运，甚至推动社会与时代的变迁。

在人类文化历史长河中，巴比伦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埃及文明及古罗马文明等都在岁月中被“蚀腐”殆尽了；而东方的中华文明，虽亦历尽烽火摧残、铁蹄蹂躏、外族入侵及改朝换代，可是，中华文化的坚韧生命力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使其在“兼容并蓄”的吸纳与糅合、会通与融合之下，以汉文明为主体逐步壮大和丰富起来。

今天，中国古代圣贤先知们的著作、至理名言，不但教导并引航了炎黄子孙自强不息，取得了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成就，而且也争取了 21 世纪人类大舞台的更多的话语权。

季羡林先生曾这么描述：“19 世纪德国伟大诗人兼思想家歌德在 1827 年与爱克曼谈话时大大地赞扬中国小说、中国文化、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和道德水平。因此，他认为西方人应该向中国人学习。”近代西方伟大艺术家毕加索也曾对东方一代宗师张大千表示了对东方艺术的欣赏与赞扬。

中国的东方绘画的写意创作，启发了西方 19 世纪以后的印象派以及许多现

代主义的创作。儒家的人文主义与道德观,逐渐影响了西方人的思想感情。

《孙子兵法》更成了美国西点军校必修课本。尤有甚者,以孔子、老子为代表的轴心时代诸子百家著作,近年正在加快深入到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中西医学的互补与结合,更为人类健康带来喜讯。越来越多的西方有识之士从中国古代伟大圣贤的学说中寻找新的文化元素,以便补充、壮大、丰富自己的文化。

人类起源的历史表明,地球村的居民从“诞生”到有了文化,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段“迸溅”出来的。人类的文化本来是一体的,但却因居住与生存的空间有别,地理环境、水源气候有异,造成了生息作业、习俗传统等文化方式的种种差异,不同地方的人们在文化的创造与表达上迥然有别。同时,山川地理相隔,无际海洋阻挠,交通、通信不便,也使得人与人的往来与沟通遭遇长时段的隔绝,并因此导致了非理性的抗拒。21 世纪的今天,高端科技迅速发展,人们不但探索外太空与宇宙的奥秘,更破解了人类生命基因。电子信息技术,穿越了千山万水,把人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互补与结合,符合文化发展的需求。东西方文明若能跨越传统文化族群与疆界而相互结合,取长补短,会通兼容,则将有望为未来地球村的全体人民创造美好的和谐互爱的生存空间。

今天,我们强调人类文明的对话及多元一体的文化发展规律,以抗拒过时的西方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是为了地球村人民的安居乐业并兼爱、互敬与和谐共处于大一统的世界里。我们深知这条漫长的人类文明“长征”路途并不好走,崎岖、曲折、颠簸。但,我们相信当今世界有良知、有学问、有智慧的知识分子、专家、学者大有人在!

我们更坚信,任何事情只要把人民放在首要考虑的位置,“为生民立命”,则将会感动、感化更多人与我们并肩牵手踏上这人类文明征途!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2012 年 11 月 8 日凌晨于岛国

(作者:林祥雄,炎黄国际文化协会会长)

《炎黄文化研究》与文化走出去战略

◇王震中

《炎黄文化研究》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与陕西黄帝陵基金会和湖南炎帝陵基金会共同主办的一个综合性学术文化丛刊。它最早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炎黄春秋》增刊的形式出现的,十年间编辑出版了十辑。到 2004 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将它办成完全独立的学术文化丛刊,由轩辕黄帝故里所在地的河南省的大象出版社惠予出版。自 2006 年起,又把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一家办刊改为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与陕西黄帝陵基金会和湖南炎帝陵基金会三家合办。

我们知道,“炎黄文化”这一概念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个层面,狭义的炎黄文化指的是传说中的炎黄时代所创造的文化,而广义的炎黄文化不但包括炎黄二帝及其时代所创造的文化,也包括炎黄子孙所创造的文化。广义的炎黄文化实际上与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同一性。1991 年,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莅临大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在他的讲话中就指出:“中华炎黄文化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文化。它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在当今世界上,凡是炎黄子孙,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只要他良知未泯,都不能不为辉煌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而感到自豪。”(见王仁民主编:《炎黄颂》,中国经济文化出版社,2003 年,第 1—2 页)由于有这样的认识,我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自成立之日起,在研究和弘扬炎黄以来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建设民族的精神文化家园、增进海峡两岸骨肉同胞联系、加深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开展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使中华炎黄文化为世界文明做出新贡献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诸如举办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有七届“21 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组织出版《中华文化通典》、《炎黄汇典》等各种图书,创办《炎黄春秋》和《炎黄文化研究》这两个刊物等,就是围绕上述目的而展开的。

《炎黄文化研究》自创刊以来,得到学术界同人的有力支持,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说到学术界同人的支持,许多著名的学术大家和活跃在第一线的知名学者都在《炎黄文化研究》上发表了自己的文章。例如,许嘉璐的《中华文化与异质文化》、《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对话》,袁行霈的《国学的当代形态与当代意义》,张岂之的《民族复兴与文化责任》、《论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汤一

专论 介的《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融会“中西古今”之学》、《儒学伦理的出发点》,丁伟志的《再论传统文化的性质与作用》,方克立的《关于和谐文化研究的几点看法》,林祥雄的《人类文明的反思》,季羨林的《〈中印文化交流史〉序言》,李学勤的《“列国汉学史书系”序》,陈高华的《〈元代文化史〉绪论》,陈祖武的《谈〈四库全书〉》,傅璇琮的《〈长安学丛书〉序》,瞿林东的《中国修史传统与中国文明传承》,钱逊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刍议》,宁可的《关于文化的随想》,杨曾文的《中国佛教的和谐理念及其在当代的意义》,李伯谦的《考古学视野的三皇五帝时代》,石兴邦的《中华龙的母体和原型是“鱼”——从考古资料探“中华龙”的起源和发展》,许顺湛的《中原第一城——黄帝时代的郑州西山古城》,张文彬的《中国近年重要考古发现及其文化价值》,王蒙的《关于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的思考与建议》、《老子的思想对治国理政的参考》,马凯的《让中华民族的盛大节日更加丰富多彩》,鲁淳、王俊义、王才的《文化自觉与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鲁淳的《费孝通学术风范永存》,赵德润的《名士直言一甲子——中央文史研究馆六十年》,乐黛云的《会通古今中西文化的先行者王国维》,张立文的《儒家文明在世界文明对话中的地位和价值》,吴荣曾的《从古文献中寻找虞舜历史》,方光华的《“国学”或“古典学”视野下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罗琨的《“人文初祖”考略》,阎纯德的《汉学试论》,郝春文的《敦煌与敦煌学漫谈》,刘志琴的《饮食与伦理》,王岳川的《发现东方与新世纪中国文化前景》,池田知久的《孔子的宗教批判》,吉田笃志的《大禹九州传说的形成过程》,王震中的《古史传说中的“虚”与“实”》、《中国史前文化中的符号与文字:文字的起源》等。而且这些学者在《炎黄文化研究》上发表的论文并不止于上面列举的这些,有许多是发表了多篇。由于有这么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刊载于《炎黄文化研究》,使得该刊的学术水准受到广泛赞誉,其影响也是持续的。

《炎黄文化研究》的办刊宗旨,就是取广义的炎黄文化概念,弘扬中华人文始祖——炎黄二帝的功业,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团结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促进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的伟大复兴。因此,在栏目的设计上,有“专论”、“炎黄二帝及其时代”、“中华文明探源”、“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文物与考古”、“思潮与学派”、“探索与争鸣”、“祭祀文化”、“服饰文化”、“文化丛谈”、“文献整理与研究”等;为了加强与海外的交流,设了“海外中华文化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等;为了及时了解文化研究领域的成果与动向,设有“书评与书跋”、“学术动态”等;为了介绍对中华文化做出突出成就与贡献的老一辈学人,还特设了“中华学人”一栏。诚然,每辑根据稿源的情况,有的栏目有所变化。总之,这些栏目的设立践履和体现了我们的办刊宗旨,并能反映研究会及研究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可看出《炎黄文化研究》的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海内外对于民族文化的热忱和寻根祭祖的热忱,持续不断。《炎黄文化研究》对建设海内外华人的精神文化家园,也发挥着它应

有的功能。“有祖大家祭”是《炎黄文化研究》秉持的原则,允许不同的观点看法争鸣,但不失和气。对于学术文章,采取学术问题学术性地对待。只要有利于建设精神文化家园,有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有利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有利于学术课题的解决或学术研究的推进,我们都欢迎,并给予有力的支持。当然,我们也很注意学术规范,以确保本刊的质量和声誉。

当今世界,全球化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与文化生活。全球化进程中,多样化的价值观既有冲突、蜕变,亦有文化认同需求。全球化呼唤文明之间的对话,需要我们的文化走出去。在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炎黄文化研究》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做出什么样的贡献,这是我们这些办刊人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研究、弘扬炎黄文化也即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于海外华人而言,它有民族凝聚力的作用;而对于西方文化而言,它有文化交流、对话、借鉴的作用,也有共同繁荣、共同为人类文明添砖加瓦的功能和作用。

在文化走出去和文化认同中,我们可以用两面镜子反省和反观国内现实中某些丑陋的现象,使现实文化得到净化和升华。这两面镜子,一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面是西方现代文明行为所折现出的包括中华传统文化在内的人类文明精神。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国际视野下的孔子所说的“礼失而求诸野”。近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许嘉璐会长以文明礼貌为例,指出在历史上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中华礼文化是重要的优秀传统文化,然而在当今世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和行为中,时不时地就可以看到一些丑陋的不文明行为、失礼丢人的举动和所作所为,为此,他提出可以在下一届的“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上对这些加以讨论,对种种丑陋“失礼”现象进行必要的抨击。确实,今日国人的现实生活中,礼失去得太久太多,甚至到了令人发出中华礼文化还在不在中国这样的呼唤!对照上述两面镜子,反观今日的中国文化,使我们多了一个思考世界与中国的视角,我们殷切希望中外文化工作者和研究者,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我们常说,要想真正了解一个民族,必须了解它的文化,特别是其传统文化。《炎黄文化研究》就是了解中华文化的窗口。我们现在虽然还做不到出版英文版的《炎黄文化研究》,但我们却可努力做到:第一,尽可能地多刊载海外学者的来稿。第二,多介绍国外汉学研究的进展和学术动态,让国人多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第三,及时地刊载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综述文章,无论这种研讨会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举办的,我们都会予以关注,加以报道。也希望举办方多供稿,共同做好这一工作。第四,将《炎黄文化研究》历年的各类文章,陆续转载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网站和其他相关的网站上,拓展展示的平台,扩大影响。

总之,文化走出去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弘扬中华文化的综合性学术文化丛刊《炎黄文化研究》,必将乘着中国文化大发展的东风,一步一个脚印,推

专 | 动对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入,并尽可能做到:研究与现实相结合,海内与海外
论 | 相结合,弘扬与传播相结合,学术上的“象牙塔”与走进民间相结合,古史传说和
民间调查相结合,地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相结合,历史与创新相结合,使我们对中
华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时俱进,大放异彩,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
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葛天氏与葛天氏之乐

◇周书灿

葛天氏是传说中的远古时期的氏族部落首领。《吕氏春秋·古乐》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高诱注：“葛天氏，古帝名。”高氏引张揖曰：“葛天氏，三皇时君号也。”显然，葛天氏之乐的传说，早在先秦时期已经流传。然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时期的文献如《庄子·胠篋》及上博简《容成氏》等文献中所列“古帝王”，尚未提到这位远古时期的乐舞发明者。迄东汉时期，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将葛天氏列为从传说中的太昊帝宓戏氏与炎帝神农氏之间上上圣人之一，其顺序依次为：女娲氏、共工氏、容成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混沌氏、昊天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亡怀氏、东扈氏、帝鸿氏。晋代学者皇甫谧根据其所搜集到的各种远古传说，在《帝王世纪》开篇言及：“及女娲氏没，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混沌氏、倕英氏（《初学记》脱此一世）、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凡十五世，皆袭庖牺之号。”至唐代司马贞作《三皇本纪》，更综合前人所编排的“三皇”传说，置于传说中的“五帝”之前，第一次补写《三皇本纪》附入《史记》：“燧人氏、大庭氏、栢皇氏、中央氏、卷须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混沌氏、昊天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斯三皇以来有天下者之号。”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贞作《三皇本纪》乃综合此前破绽百出、歧疑丛生的各种传说而成。司马贞在《三皇本纪》中曾讲到，三皇以来的古史人物，“载籍不记，莫知姓、王年代、所都之处”，“无怀之前，天皇已后，纪年悠邈，皇王何升而高，但古书亡矣，不可备论”。尽管如此，司马贞仍然确信，“图纬所载，不可全弃”。司马贞对待炎黄以前的古史传说，所采取的态度是当信则信，当疑则疑，显然他的这一历史观念有助于科学地破解史前时期的诸多千古之谜，对于今天科学深入地探讨葛天氏传说的发生及其演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先秦时期嬴姓葛国在宁陵县一带，属皋陶集团

应劭《风俗通义·佚文·氏姓》说：“葛氏，葛天氏之裔，子孙氏焉。夏时葛伯，嬴姓国也，亦为葛氏。”《姓纂》十、《通志·氏族略》、《路史·前纪七》、《合璧

事类》续十四、《翰苑新书》后七、《秘笈新书》别三等文献均有类似记载。显然,较早的文献揭示出,葛氏应至少有两个独立的来源,二者之间未必存在什么关联。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世学者往往将葛天氏之后的葛氏与以夏商周时期嬴姓葛姓之后的葛氏混二为一,从而造成古国、古族及其地望问题上的一系列混乱,兹颇有必要进行一番辨正。

先秦时期葛国史迹见于《左传》、《孟子》等上古时期的文献。

《左传》桓公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来朝。”

《左传》僖公十七年:“齐侯好内,多内宠,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姬生武孟,少卫姬生惠公,郑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华子生公子雍。”

《孟子·滕文公下》:“汤居亳,与葛为邻。……汤始征,自葛载。”

根据以上记载可知,葛为商汤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嬴姓古国,历经商、西周时期,一直延续至春秋时期。该葛国地望,杜预为《左传》作注曰:“葛国,宁陵县东北。”《汉书·地理志》陈留郡宁陵县,注引孟康云:“葛伯国,今葛乡是。”《元和郡县志》宋州宁陵县下云:“故葛城在县北十五里,古葛伯国。”夏商周时期的嬴姓古国葛国,地望在今河南宁陵县一带,古代记载并无二致。尽管清代以后,有学者对以上观点产生过怀疑,如王夫之以为:“此葛盖所谓葛峰也,今兖州之峰县。”(《船山全书》第五册《春稗疏》,岳麓书社,2011年,第32页)沈钦韩以为:“葛城在归德府宁陵县北十五里,古葛伯国然疑此,亦泰山旁小国也。”(《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第78页。《清经解续编》第三册,卷598,上海书店,1988年)杨宽先生也曾据以上推测:“与邾、牟之君同时来朝的葛君不可能远在河南宁陵北……当为泰山旁之小国。”(《西周列国考》,《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9页)但在今天看来,以上推测均缺乏足够的文献和考古学证据,难为定说。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尚难以彻底推翻杜预以来先秦葛国在今河南宁陵县一带的说法。

嬴为上古时期东方氏族重要的姓之一。王符《潜夫论·志氏姓》说:“梁、葛、江、黄、徐、莒、蓼、六、英,皆皋陶之后也。”然许慎《说文·女部》则说:“嬴,帝少皞之姓也。”段玉裁为《说文》作注,强之疏通:“伯翳嬴姓,其子皋陶偃姓,偃、嬴语之转耳。”徐旭生先生说:“段说甚是,偃、嬴原来当是一字。皋陶与少皞同姓,足证他们属于同一氏族,而前人出生较后人为后。”(《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2页)童书业先生进一步推测:“皋陶盖为淮夷族之祖,亦东方民族之祖先神也。”(《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8页)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夏商周时期宁陵一带的嬴姓古葛国的早期历史,与传说中的葛天氏,似难以建立起什么联系。

二、葛天氏的族属与地望蠡测

综前所论,葛天氏至迟于唐代已归入传说中的三皇古史系统,然而由于远古时期文献材料的极度贫乏,有关葛天氏的族属及地望问题,犹如一团迷雾,难以揭秘。然汉唐时期的学者将葛天氏编排至传说中的炎黄以前的古史体系,毫无疑问。相对于数量众多、早已失传的古老氏族、部落,葛天氏应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先民之一。战国时期文献《世本·氏姓》所列传说中的有熊氏之后有瞻葛氏。瞻葛氏与远古时期的葛天氏有无渊源关系,尚缺乏直接可靠的文献证据。如果以上假说能够获得文献和考古学材料的有力支持,则可推测,随着时间的推移,葛天氏的后裔很可能直接融入以炎黄为源头的华夏族中,成为华夏民族的重要源头之一。

就文字推测,葛天氏似与藤本植物的“葛”有某种关联。葛属豆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茎可编篮做绳,纤维可织葛布,根可提制淀粉,又供药用。《诗·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王风·采葛》:“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周代王城及周南一带,均有葛类植物生长,葛或为当时人们重要的生活、生产资料。今河南长葛地名起源,可以追溯至春秋早期。《春秋·隐公五年》:“宋人伐郑,围长葛。”杜注:“颍川长社县,北有长葛城。”《水经·洧水注》:“(洧水)又东径长社县故城北,郑之长葛邑也。《春秋·隐公五年》,宋人伐郑,围长葛是也。……长社县北有长葛乡。”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四十七《河南二·许州长葛县》说:“在州北五十里。春秋郑地,隐五年宋人伐郑,围长葛。又曰繻葛。”春秋初年长葛得名是否与传说中的葛天氏有某种关联,明代以前的文献中未有明确记载。迄明正德十二年车明理撰写的《长葛县志》、清乾隆十二年阮景咸撰写的《长葛县志》均载“长葛为古葛天氏之墟,其得名实始见于春秋,迄至于今盖已两千余岁矣”;民国19年长葛县志记载:“长葛,盖葛天氏故址也,后人思永其泽,故名曰长葛。”至今流传着大量与葛天氏相关的民间传说,留存着大量相关遗迹、祭祀仪式,古乐歌舞“葛天之乐”。尽管以上记载时代较晚,但以上传说或当有更早的发生、衍变过程,尚不能彻底否定。

三、关于葛天氏之乐

前引《吕氏春秋·古乐》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以前,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葛天氏之乐作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见解。如有的学者推测,葛天氏之乐既是一组原始乐舞,又是一场关于农业丰产祭祀的巫仪。“三人操牛尾”,表现的是一种巫术,它存在于世界各地都曾有过祭祀的巫礼——“杀牛祭”中。(孙文辉:《古乐〈葛天氏之乐〉的文化阐释》,《文艺研究》1997年第2期)有的学者则肯定地说,“八阙”产生的时代在